

海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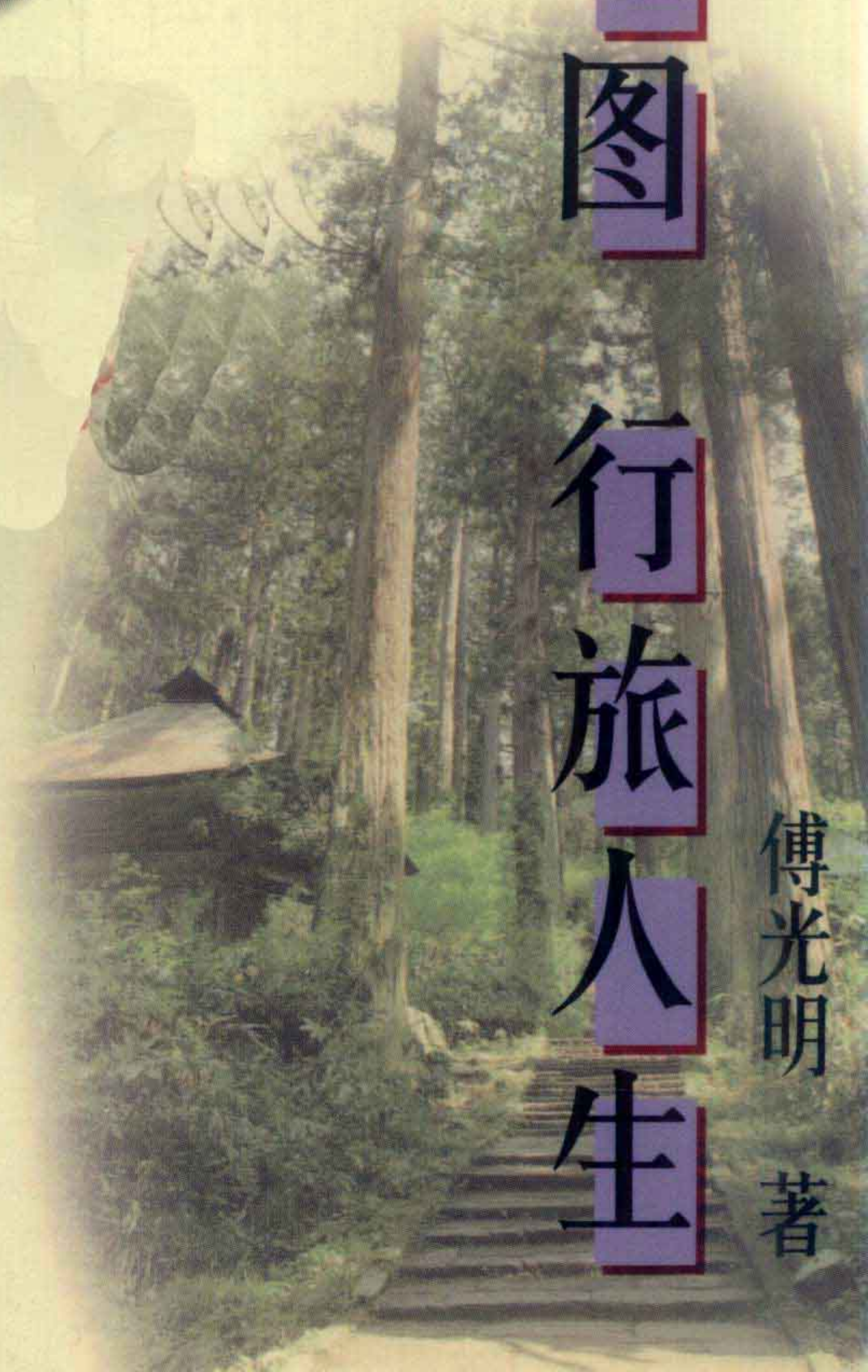
萧乾卷

下卷

未带地图

行旅人生

傅光明 著



譚芝書系·蕭乾卷下

傅光明 著

海天出版社

未「帶」地圖

行「旅」人「生」



在走出噩梦的早晨，我以我的笔作 拐杖，又开始了我的人生旅行

萧乾说自己是个不带地图的旅人，他的目光孤独又忧郁，微笑顽皮又快乐，脚步是浪漫又执著。到了晚年，用回忆的眼凝视那已逝岁月的年轮，他能看到它们或清晰或模糊，或灿烂或晦暗，或圆满或曲折……他曾寄人篱下，世界对他变得那样狭窄。他甚至怀疑生命本身就是个极大的谎言。但他无法拒绝血脉中所承袭的一片阳光，一泓暖流。他有梦，梦中的生命如绚丽的红玫瑰在原野怒放，灵魂像没有飘带的风筝在无垠的天空下自由翱翔。为这梦，他磨砺笔。为这梦，他要走向广大的人生，要到阳光下去思索。他要的就是要体验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他要采访的是人生。在二战的烽火硝烟中，在死神张大的羽翼下，他弹奏着生命的乐章。他把一本厚厚的《人生采访》献给贫弱的祖国。为着祖国强盛，他像信鸽飞回家乡一样，旅英7年之后，又扎进了她的怀抱。

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灾难岁月他曾变成一只噤声的寒蝉，觅尽寒枝无处栖。他时时想自己咬断维系着飘忽不定的生命年轮的那一根游丝。在走出噩梦的早晨，他以笔作拐杖，又开始行旅人生了。他的手已有些抖，脚步也有些颤，但他觉得自己的心还可以和5岁的孩子比年轻。他对不带地图的旅行无怨无悔，直到终极。

我很幸运，打1987年5月7日上午走进他家的门，结识这位长我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到他去世的1999年2月11日，整整12年里，他一直是精神上最大的支撑和最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除了编选他的十卷文集，我还编过他的十几本书，写过他的

传记和评传。加上帮他整理的《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这已经是第5本。也是我最下心的一本。

因给他编文集，他说我是帮他一生做总结的人。不过，这倒给我一个重新认识他的机会。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宽敞的缩微阅览室查阅旧《大公报》时，发现他年轻时并不疏懒。他的笔很勤很快，从他在战时英伦发回报社的特写来看，他写得又多又好，而且这些都是经第一手采访写成的。难怪有史家把他二战期间的特写誉为“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当我把从缩微胶卷上还原出的旧作拿给他看时，有的他都忘记了。有许多文章，我也是在编选时第一次读到。真实又惊喜又惭愧。惊喜是为我泡在故纸堆里的新发现，惭愧为我对他并没有想象的那般了解。我感觉，他除了是一个真诚的作家，某种程度上，他还是个深刻、睿智的思想者。对后者，我原竟没有足够的认识。

我最难以忘怀有两个夏天，每周两次一大早骑车到他家，先陪他去离他家不远的玉渊潭畔散步，然后再去文学馆上班。那是一老一小两颗心灵沟通交融的两个夏天，是朝晨清新空气里弥漫着一位历尽沧桑、风雨平生的老人睿智思想的两个夏天，也是我生命成长里充满了灵性的两个夏天。他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他及其同时代作家文人的故事。我自会用想象去感受那里面的辛酸悲苦、荣辱欢欣。

漫步的时候，我们话题很多，但往往最终全落在“讲真话”上。我感觉80年代以来，巴金和萧乾是最不遗余力倡导并带头“讲真话”的作家中的两位。

萧乾在过去假话横行的灾难岁月里，看到许多人因说真话倒透了霉，更多的人却是靠说假话青云直上。飞得最高的自然是那位一个之下、万人之上、“永远健康”的林彪。即便现在早不是讲话得先背语录的年月，可说真话同样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

难。巴金在“文革”中吃够了说假话的苦头，看到说假话可以误国，甚至会带来亡国的危害，才从80年代开始，那么敢于通过自我否定和忏悔，大声疾呼要人们讲真话。他捧给世人的是一颗中国文化人的良心。

萧乾一方面由衷地拥护讲真话，但一想到遇罗克和张志新的遭遇，就心有余悸，不能不做某种保留。他信守的原则是“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他因此还被“少不更事”的后生讥为“太过聪明的中国作家”之一。他深知说真话和不说假话的困难。有的人喜欢听真理，不喜欢听真话。可那位说尽了“真理”而没有真话的副统帅却险些把共和国推入死亡的深渊。因为更多的时候，假话是抹了蜜的，而真话却是浑身带刺。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宁肯在蜜罐里泡烂，也不愿让刺扎一下。萧乾之所以认为巴金讲真话的《随想录》比他30年代的《激流三部曲》时代意义更伟大，就在于他明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真话畅通，假话失灵，就好比是把基础建在磐石之上，国家民族才能振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萧乾写了许多篇“尽量”说真话的力作，如《巴金与20世纪》、《我这两辈子》、《唉，我这意识流》、《南柯噩梦》等散文。把它们编在一起，同样是一部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良知和精神思想的“随想录”。这“随想录”的时代意义，也超过了他早年的文学创作。

在《南柯噩梦》一文中，他是多么希望我们能好好总结历史上那最不愉快一页的沉痛教训，不要为了自己和大家的面子，投鼠忌器，把触及历史灵魂的责任留给毫无切肤之痛的后世子孙。他说，不能设文革博物馆可以理解，因为第一张大字报的难度就不好逾越。然而可不可以认真总结一下导致十年灾难的诸种历史因素？中国人连死都不怕，难道就怕抖落一下往日所吃的亏，所上的当？那结论对亚洲，对世界，也将是一不可磨灭的大贡献。

他深感在这方面畏畏缩缩，裹足不前，到 21 世纪如何阔步前进！另外，还是那句话，如果下一代人不清楚前人所犯的错，很可能重蹈覆辙。

《唉，我这意识流》是他面对历史，感时忧国的“真话流”。由于总管不住意识流里的真话而把它释放出来，才屡次吃政治的亏。因此，他的乌托邦很简单，就是一个人人有话就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能痛痛快快说真话的世界。再也不用担心思，绕弯子，害怕后果。若是人们不敢掏心窝子，对谁都须提防戒备，真话不能尽情吐露，只是埋藏在自己的意识流里，那将同天平、尺度全丢进大海的十年毫无二致：说真话的受到重惩，甚至家破人亡；说假话的却官运亨通，从厚奖励。谎话当道，真话绝迹。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过去就是太舍得奖励像姚文元之流由“乌鸦化装的鹦鹉”了，而对像彭大将军那样敢进逆耳忠言的人，又太狠了，闹得几乎亡党亡国。

有限的历史知识告诉我，中国历朝历代，敢于直谏的忠臣，只有遇上明君才得善终，而进谗言献媚的佞臣却往往官居显要，权倾朝野。若谏臣居功至伟，朝逢盛世；若奸佞揽权当道，国必衰亡。萧乾认为，真话当然不一定全对，但只要是忧国忧民，发自肺腑的，就该让它倾吐出来，而不能压制它。鲁迅先生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若要不爆炸，不灭亡，还是让人们把埋在意识流里的真话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出来。

一个听得进真话的社会和政党是有希望的，一个任假话泛滥的国家和政府是势必要垮台的。

和他一起散步，我也生出不少遐想。原本想等手头闲下来，把那些思绪想法写成卢梭式漫步遐思录一类的东西。前边没准加上个“玉渊潭”什么的。哪知人老心健笔快的他，很快就把他的

这些思想的“意识流”抒写成《玉渊潭漫笔——萧乾随想录》。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时间和读者是最公正的批评家

萧乾生命的最后两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他是因大面积心肌梗塞住的院。病情稍有好转，他便不安分起来。他觉得医院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写作的空间。只有思想是自由的。其实对他这已经足够了。但说话时间一长，走路稍快，心跳马上达百次以上，再加上他的肾功能不全，只有常人的十分之一，医生是不敢让他出院的。

打小淘气的他，好像从来就不曾老实呆过。一生大半辈子又在跑江湖，用一支多姿多彩的笔采写广阔的大千世界。东跑西颠了一辈子，叫他静卧在病榻上，可实在有点把翱鹰逮进笼子的味道，怎么受得了。他还最怕打吊针，而为了治病，医生曾一度指定每天打两次。尽管他总把收音机或CD机放在身旁，为他奏着古典音乐，但望着那挂在头顶的输液瓶，心里就起急，不耐烦。

他的生命力真顽强。病情稍一稳定，他就开始读书，写书评。他还想独创作家文集的体例，为所收的有些作品，写个时过境迁以后的“余墨”。我那时正在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选十卷本的《萧乾文集》。这“余墨”就是为它而写。所谓“余墨”即是对自己过去所写过的一篇篇小说、散文、特写、杂文等，做一个勾勒式的回述，交代一下当时的写作背景、环境，觉得意犹未尽的再借题发挥几句，使读者能更清晰地体悟其中的思想脉络。两年生病期间，他一共写了数十篇“余墨”、书评，约10万字。

我每周至少去医院看望他一次，给他带些他想看的书，再就

是陪他聊天，他老是那么认真地听我道听途说或从别处贩来的外面及文坛的新鲜事。为使自己能静下来，他甚至找我要了串佛珠，打算静心地闭目参禅，摒除杂念。可他无法管束自己那跑野马般的思想，无论躺着、坐着，或在走廊里散步，他总在不停地想，这也正是医生最担心的，一个年奔90岁的心梗病人，一天到晚脑子里老装那么多事怎么成。

受舒乙先生所邀，我在北京幽州书院做过一次题为“萧乾的生平及其创作”的演讲。他听完我的演讲录音，马上一口气给我写了封长达5页的信，叫我非常感动。他谦虚地写道：“我不能同巴金或冰心大姐相提并论。他们的成就远比我大，是一代的宗师，我只能做他们的一个追随者。自然，我一生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反宗教小说和二战的采访。这些你都提到了”。

读完王蒙先生发表在1997年《花城》第二期上的长篇小说《踌躇的季节》，他特地把我叫去，跟我说这简直是一部革命世故大全，足见处世之艰辛，革命途路多荆棘，还得随时提防陷阱。他称赞王蒙通过小说里的表舅形象，把50年代那段日子写得淋漓尽致。王蒙对下层北京市民的语言、神态及生活了解得也真透。临走，萧乾将这本他随手批了旁注的杂志送我。不几天，他又写信给我说，“此作艺术性不算高，个别地方几乎抄资料，但整体来说，是篇对五六十年代整个社会的一次巧妙、生动，甚至惟妙惟肖的再现。读时，有时感到王蒙胆子好大！文字有时深刻、幽默，令人哭笑不得。”

病魔吞噬着他，他说话越来越没有气力，字也越写越不成型。1998年底，他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将出的《林徽音文集》所写的序言《才女林徽音》，就是由我代笔的。这成了他的绝笔之作。1999年1月底，当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由我采访整理的《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我请他在扉页为我留言时，他歪

歪斜斜地写道：“我晚年幸事之一，是结识了傅光明同志。首先，他用他的青春减少我的暮气。我祝他有一光辉的人生。”这是他给我的最后的文字。我知道，他不甘心就这么放下手中的笔，但这笔对他已是太沉重了。我感觉到他的日子不多了，一想到此，我的心就流泪。

不过，他该是幸运和满足的。他临终前看到了总结他一生文学成就的10卷本《萧乾文集》的出版。而且，在1月27日他90岁华诞之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文史研究馆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了“萧乾文学生涯70年暨《萧乾文集》出版座谈会”。朱镕基总理于会前专门写来贺信，信中写道：“感谢您赠我全套《萧乾文集》。先生毕生勤奋，耕耘文坛，著作等身，为中国之文学、新闻、翻译事业做出宝贵贡献。我在中学时期，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受益匪浅。深望保重身体；永褒艺术青春，共同迈入21世纪。顺祝90华诞。”遗憾的是，他却在新世纪的门槛前离去了。

1999年2月11日对我是个痛不欲生的日子。他的仙逝，对我不啻失去了亲人一般。他是我的文学导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更是长我半个多世纪的忘年“老”友。当我在北京医院D-214病房亲吻他的面颊，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当我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默默随着告别的队伍深深三鞠躬为他送行的时候；当2月24日下午两点，我仰望天空，看到他化成一缕青烟飘逝的时候，我仍然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他真的已撒手西归，离我而去了。

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个真诚、善良、悲天悯人的可爱老头儿，他有时像个深刻的智者，有时又任性率真得像个孩子。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有时坚强，有时脆弱；有时仗义执言，秉笔畅怀，敢讲真话；有时又谨小慎微，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从他身

上，我感受到中同知识分子道德良知的一面，同时也感受到内质软弱的一面。他曾那么不遗余力地修改自己的作品，以期适应环境的需要。最后，他还是有勇气在文集中全部还原作品的旧貌。他说，快90岁的人了，也没什么好怕的。一生所经历的坎坷沧桑，是非曲直，也没什么可遮掩的。……我一直以为，时间和读者是最公正的批评家。我愿意把我这一生，以及这一生所写的文学作品，毫无保留地交予时间和读者去做“末日审判”。

我愿像他一样，把自己当成一道小小的浪波。浪波的寿命总归短暂，大海则是永恒的。“我原来自大海，仍将回到它的怀抱。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它给予的。我也必把自己的全部献给它，直到最后一滴”。

在我的眼前，他并没有走，他仍然在他那凌乱的书房里奋笔疾书，谈笑风声。他坐在那把破旧的木圆转椅上，歪着头，晃着脑袋顶上几根稀疏的白发，对着我笑，笑得那么天真，那么顽皮，那么诚实，那么智慧。我要伴着他的笑度过我的一生。

我想，到我死时我都会毫不迟疑地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是结识了萧乾先生。

7. 恩 怨

沈从文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
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

萧乾的第一个文学师傅是沈从文，他们结识于 1931 年。当时，萧乾正在辅仁大学同安澜合编《中国简报》，经国文课老师杨振声介绍，去采访沈从文。已是著名小说家的沈从文对这位文学青年十分热情，头一次见面便请他到东安市场下馆子吃饭。沈从文从伙计手里要过菜单，用毛笔在上面写起菜名。萧乾很崇拜这位作家，见他写的一手秀逸的书法，急忙唤住转身欲走的伙计，说“这个菜单您给我吧，我再给您抄一遍”。沈从文冲他一摆手，说“要菜单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写很长的信”。沈从文对人热诚，他自己即为徐志摩所助，故乐于助人。打这以后，还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给萧乾写过许多信，而且总是以“乾弟”相称，透出亲情的关爱。他们的友谊由此开始。

1932 年夏，萧乾因实在无法忍受那位心地善良但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雷德曼，离开辅仁，南下福州，跑到仓前山英华中学教国语。雷德曼是位爱尔兰裔美国神父，萧乾读辅仁英文系时，他是英文系主任，培养起萧乾对爱尔兰诗歌、小说以及戏剧的爱

好。萧乾觉得雷德曼好像是爱尔兰的苏曼殊，他不光酒喝得冲，而且完全浸淫在 19 世纪爱尔兰浪漫主义文学里。萧乾时常听他吟诵叶芝的诗，或朗读约翰·沁、奥凯西以及葛瑞果蕊夫人的剧本。

雷德曼还鼓励萧乾为北平《晨报》写些关于爱尔兰小剧院运动的文章，如《葛瑞果蕊夫人逝世感言》和《奥尼尔与〈白朗大神〉》等。雷德曼看到萧乾在《中国简报》发表的东西，就一再怂恿他为辅仁的天主教刊物《辅仁杂志》翻译点中国作品。萧乾先后将自己喜欢读的三个剧本译成英文，有郭沫若的《王昭君》、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和熊佛西的《艺术家》，发表在这份向全世界天主教文化界发行的英文月刊上。萧乾最早的翻译实践，还真该感谢这位雷德曼。

1933 年夏秋，萧乾由福州回到北平，即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没过多久，他就收到沈从文一封信：

秉乾弟：

见某日报上，载有燕大编级生一个你的名字，猜想你到了北平。我已从青岛跑来北平，目前住西城西斜街五十五号甲杨先生家里，想出城来找你，可一时不能出城。你看有事进了城，爱依然骑你那自行车到处跑，高兴跑到我住处来玩玩，我大多数总在家中。晚上不便回校可住在我处。

很念你。

从文

八月九日

收到沈从文的信，萧乾满怀喜悦，骑上自行车，直奔西斜街

的杨振声家，见到阔别已有一年的师长。很快，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在府右街达子营安了家，萧乾便成了这里的常客。当时，他正和女友高君纯热恋，也梦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温馨甜蜜的家。

萧乾这时已经把写小说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他自己并不满意已在《燕大月刊》上发表过的小说习作《梨皮》和《人散后》，渴望得到一位师傅的引导。沈从文很喜欢这个勤奋、生气勃勃、勇敢结实的青年。他把他看成同自己一样的“乡下人”，并“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

沈从文对这位徒弟要求很严，让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反复润色，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沈从文对语言的这种认识，深深影响了萧乾。他明白字是个死板的东西。在字典里，它们都僵卧着。只要成群地走了出来，它们就活跃了。活跃的字，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他跟师傅学着把文字当成绘画者的颜料，“在把笔尖点在纸上那刻，他心智的慧眼前已铺出一幅连环图画，带着声音和氛围，随着想象的轮无止息地旋转。绘画者的本领在调匀适当的颜色，把这图画以经济而有力的方法翻移到纸上去”。确实，萧乾在学习运用精致鲜活的语言文字，同时也力求恰当地掌握文字经济学，因为师傅告诉他，你应当明白“经济”两个字在作品上的意义，不能过度挥霍文字，不宜过度铺排故事。他努力只在给读者一个“印象”。

萧乾每次来达子营沈家，都觉时间过得太快。师傅的每一句话都深深扎进他的脑海：“据我经验说来，写小说同别的工作一

样，得好好的去‘学’。又似乎完全不同别的工作，就因为学的方式可以不同。从旧的各种文字，新的各种文字，理解文学的性质，明白它的轻重，习惯于运用它们，这工作很简单，落实，并无神秘，不需天才，好像得看一大堆‘作品’，作无数次试验，从种种失败上找经验，慢慢的完成他那个工作”。

有一次，萧乾问师傅一个文学青年最爱问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师傅告诉他一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个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和友谊”。

萧乾听得醉了，骑车回燕园的路上，他脑子里始终在回味着师傅诗一般的写作哲学。他相信师傅说的，在文学道路上，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头苦干。有这样的师傅引路，没有理由不努力，一定要多看别人的作品，捡那些最好的看，’多经历人生，要紧的是要写下去！更要紧的是要读下去，看下去，想下去！想到这，他心里充满了欣悦，也增添了自信，看看天上的星星似乎都在对他笑。

达子营沈家成了萧乾文学的精神家园，他恨不能天天就呆在沈家，聆听师傅的教诲。师傅鼓励他多写，却不愿他滥写。不要当多产作家，要写得精。沈从文每次送他出门走时，总不忘半嘲

弄地叮嘱：“我希望你每月只写三两个短箱，然后挑出最满意的来看我。每月写不出什么可不许骑车进城啊”。

写作要认真，要勤奋，这是个妥实的出路。萧乾在这点上，非常钦佩沈从文，他感觉老师有一种作家独有的骄傲，在意境、人物，一切上面，都鄙视已有的，要创造新的。他的感觉极为敏锐，看得出任何一个重复的字眼，听得见任何一个扎耳的声音。他像个忠实的农夫，不容田里有一棵杂草。他不是在雕琢，他要用文字表达内在的一切。他在说出的每一句妙语，创作出的每一个有血肉的人物身上，都滴了无数的汗珠。天不亮，他就起来写作了。一篇短文，他不惜抄改四五次，而每次都觉得还可以改得更好些。他要掂一掂每个字的分量，一点也不肯马虎，因为他想用飘渺的文字勾描一幅明确的图画。字典里摆着的现成词汇，他全看不上。

初秋的未名湖碧绿清翠，天上的白云倒映在湖水里，仿佛在幻化的虚冥里漂浮，原来它在戏弄那修长俊逸的未名塔的倒影。萧乾坐在湖心的土坡上，望着湖水出神。他正在构思一个短篇，想表露自己的一点生命哲学。透过什么来替他说话呢？一个小生灵的影子忽地在他眼前清晰地蠕动起来。那是一只蚕！他记起有一年春天，他向人讨来蚕种，恰似粘在白纸上的一粒粒黑芝麻，经太阳一晒，那些黑芝麻就会慢慢变成幼虫，奇妙地蠕动起来，嫩白的身子一耸一耸的，十分好玩，可爱。单是这一奇迹，就深深引起他对生命奥秘的兴趣。

萧乾喜欢蹲下来仔细观察蚕在桑叶边上不停地啃。蚕要活命，就得吃桑叶。没有桑叶，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挨饿，束手无策。他的脑际由此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倘若世间真有个上帝，那他同人类的关系，大概就像我之于蚕。他还由蚕的大与小，肥与瘦，生气勃勃与死气沉沉之分，联想到人间的贫富不均

和弱肉强食。他在崇实中学时，星期天做礼拜，洋牧师在台上讲完上帝的博爱，就可以回屋去闻厨房里飘出来的奶制品和烤肉的香味，而等着他的却总是窝头咸菜。当时他幼小的心灵便产生疑问，倘若真有个万能的上帝，他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不平等存在？对，借蚕来写宗教的虚幻，该是一个多么妙的构思呀！那该怎样谋篇布局呢？他就把和君纯的恋爱搬到小说中的闽江之畔，仓前山大桥上的花市，有他钟爱的土名叫“十八学士”的玉簪花，君纯又刚好是福州人，还没回过家乡，正好可以让她在小说里回家。还要把蚕在他和君纯合影的照片上吐丝的细节写进去，作个爱的纪念。

萧乾被成熟的构思刺激得兴奋不已，一溜小跑回到宿舍，铺开稿纸，任诗一样的文字音符从笔底弹奏出来：

于是，把带回来的一束叶子精心加以料理，用小剪子咬去生硬的叶梗，咬去糜烂枯黄的叶边。又选几片葱绿的嫩叶剪成散锦的星颗和一面缺的月。等小匣子给清新的绿氛溢满了，才小心翼翼的把浮在几片大叶上的蚕儿们捧出，像慈母卧婴儿似的一条条轻轻的放进锦盒里。有的一放，高兴得打了个滚儿，就驼起背来，一耸一耸地找寻所需要的食料去了。有的一放，还恋恋不舍的，抬抬头，寻觅这温存的主人，似乎想明白一件事，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一份命运，到了这种地方。

萧乾的草稿很乱，他可不能让师傅费神去辨认涂鸦似的字迹。他将这篇叫《蚕》的小说，认真誊抄在印有燕京大学字迹的红格稿纸上，寄给了沈从文。这一天是1933年9月29日。

一个月以后，11月1日，萧乾在燕大文科楼的阅报栏前不

经意地浏览《大公报》。当他看到副刊版上发表的小说《蚕》，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是做梦，作者就是萧乾。他太兴奋了，整个心仿佛一下泡到了蜜罐里。那份激动的紧张使他的大脑瞬间成了空白的，什么思想都没有了。这毕竟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处女作。他静下心来，又仔细读了一遍《蚕》。五千来字的小说，密密麻麻挤在四千来字的版面里，成了黑乎乎的一片。一定是版面太紧张了。但那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心血的结晶，读着读着，他觉得这五千多个字都跃出版面，活了起来，跳舞的姿势是那么轻盈、可爱。

萧乾的心也在跳舞。他从心底感激师傅的鼓励和提携。细心的他发现师傅在许多处做了修改，这使他受益匪浅。他后来写道：

看到印出来的文章时，你就不曾理会删改的痕迹吗？我是曾这样麻烦过另一个朋友的。我曾脸红。我觉得是犯了罪，那样过分地麻烦一位满心帮我而又负着很重责任的人。我日夜咬住牙，想拼着写一篇用不着他动笔改的文章。自然，到如今我还只是在努力着。但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学着他那简练的榜样，我少用“虚”字，少说无力的废话。自然我还不行，我必仍得努力下去的。

编辑总抱怨萧乾的字太多，而他一味嫌《文艺副刊》的篇幅少，连爱伦·坡那样：“标准短篇”也登不完。沈从文对他充满友爱地正色责备他：“为什么不能！那是懒人说的话。”

没过几天，萧乾收到沈从文的信，说“有一位既聪明又高贵的小姐”要见他，因为那小姐说《蚕》是沈从文主编《大公报·